

孟子譯注

楊伯峻譯注

22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孟子譯注/楊伯峻譯注. - 北京:中華書局,1960.1
(2006重印)

(中國古典名著譯注叢書)

ISBN 7-101-00397-4

I.孟… II.楊… III.①孟子-譯文-②儒家
IV.B222.5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0)第 68420 號

孟 子 譯 注

楊伯峻 譯注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北京未來科學技術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16 印張·376 千字

1960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2 版

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5 次印刷

印數:234651—240650 冊 定價:31.00 元

ISBN 7-101-00397-4/B·77

導 言

一

孟子名軻①，鄒國人②。關於他的父母，我們知道得很少。春秋演孔圖以及闕里志等書說他父親名激，字公宜；母親娘家姓仇（音掌），自然是些無稽之談。西漢韓嬰的韓詩外傳載有他母親“斷織”、“買東家豚肉”以及“不敢去婦”等故事，劉向的列女傳還載有他母親“三遷”和“去齊”等故事，可見他很得力於母親的教導。

孟子的生卒年月不詳，古今有各種推斷。用孟子原書來核對，我們認爲他生於周安王十七年（公元前385年）前後一說比較合理③。元程復心孟子年譜④等書都說他“壽八十四歲”。如果可信，卒年當在周赧王十一年（公元前304年）前後。當孟子出生的時候，孔子已經死了將近一百年；孔門弟子沒有一位還活着。列女傳和趙岐孟子題辭都說孔子的孫子子思是他的老師。不過根據史記孔子世家，子思的父親伯魚活了五十歲，死於孔子七十歲時；那時，子思至少也有十歲左右了。子思的年壽，史記說他六十二；後人以魯繆公曾尊禮子思的事實來推算，認爲“史記所云子思年六十二者或八十二之誤”⑤。即使子思活到八十二歲，距孟子的出生還有十多年。可見這種說法是不可靠的。孟子外書說：“子思之子曰子上，軻嘗學焉。”姑且不說外書是偽造品，就以史記所載“子上年四十七”的話來推算，也未必能做孟子的老師。孟子自己說：“予未得爲孔子徒也，予私淑諸人也。”（8·22）他所謂私淑的是什麼人，他不曾說出，可見未必是很有名望的人，也未必是孔子的嫡系子

孫。荀子非十二子篇把子思、孟軻列爲一派，則孟子的學說一定出於子思。史記孟荀列傳說他“受業子思之門人”，這是合理的。

范文瀾同志在中國通史簡編中說：“士大體分爲四類：一類是學士，如儒、墨、道、名、法、農等專門家，著書立說，反映當時社會各階級的思想，提出各種政治主張，在文化上有巨大貢獻。這一類人聲名大，待遇優，如儒家大師孟子，後車數十乘，侍從數百人，往來各國間，憑他的聲名，所到國家，國君們都得餽贈黃金，供給衣食，聽取孟子的議論。”^⑥我們從孟子原書考察，孟子第一次到齊國是在齊威王之世。當時匡章聲名不大，而且背着“不孝”的壞名聲，可是孟子却“與之遊，又從而禮貌之”(8·30)。孟子在齊國大概不甚得志，連威王所餽兼金一百鎰都拒絕了(見 4·3)。當威王三十年，宋王偃稱王，而且要行仁政(見 6·5)，所以孟子到了宋國。告戴不勝多荐賢士(6·6)，答戴盈之之問(6·8)，都在這個時候。宋王偃的爲人，史料有絕然相反的說法，戰國策記其射天笞地，史記宋世家述其淫於酒色；而韓非子五蠹篇、淮南子人間訓都說他因行仁政而爲楚所滅^⑦。從孟子看來，宋王偃大概左右不賢人多，賢人少，所以“一薛居州”不能使宋王偃爲善，孟子也就接受餽贈七十鎰(見 4·3)而離開了。當他留在宋國的時候，滕文公還是太子，曾去楚國，來回一定要經過宋國的國都彭城，因而兩次和孟子相見(5·1)。不久，孟子回到鄒國，和鄒穆公的問答(2·12)大概在這個時候。或者由於孟子回答他的言語過於率直，引起了他的不高興，便停止了餽贈，因而使得孟子絕糧(見應劭風俗通窮通篇)。滕定公死了，文公“使然友之鄒問於孟子”(5·2)。至於季任使人來餽贈禮物(12·5)是否在這個時候，就很難肯定；因爲“孟子居鄒”絕對不止這麼一次。魯平公即位^⑧，將要使孟子學生樂正克爲政

(12·13)，孟子便到了魯國。可是因為臧倉的破壞，孟子便有“吾之不遇魯侯天也”(2, 16)的慨嘆。滕文公嗣位，孟子便來到滕國。文公“問爲國”，又使“畢戰問井地”(5·3)。齊人打算修建薛邑城池，文公害怕，又曾請教孟子(2·14)。和許行的新信徒陳相的辯論(5·4)也在這個時候。滕國究竟只是個爲方不足五十里的小國，孟子很難有所作爲，當梁惠王後元十五年，便來到了梁國。這時孟子年近七十，梁惠王在位既已五十年，年紀也在七十上下，便稱呼孟子爲“叟”(1·1)。和梁惠王的問答(1·1, 2, 3, 4, 5)應該都在這一時候。第二年，惠王去世，襄王嗣位，孟子和他一相見，印象就很壞(1·6)。這時，齊威王已死，宣王嗣位，孟子便由梁來齊。“加齊之卿相”(3·1, 2)，“出弔於滕”(4·6)都在這幾年間。齊國伐燕在宣王五年，兩年之後，“諸侯將謀救燕”(2·11)，孟子勸宣王送回俘虜，歸還重器，和燕國臣民商量立君，然後撤兵。可是宣王不聽，第二年，燕國和諸侯的軍隊併力攻齊，齊國大敗。齊宣王便說，“吾甚慚於孟子”(4·9)。孟子因此辭職，宣王想要給孟子一所房屋(4·10)，孟子不肯接受。孟子離開了齊國，在畫地停留三晚(4·10, 11)，孟子一方面非常失望，一方面又因年歲已大，主張又不能實現，只得說道：“五百年必有王者興，其間必有名世者。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，以其數則過矣，以其時考之則可矣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！”(4·13) 孟子這時年已七十餘，從此便不再出遊，而和“萬章之徒序詩書，述仲尼之意，作孟子七篇”(史記孟荀列傳)了。

二

關於孟子的作者，古今有三種不同看法。

第一種看法認為孟子是孟軻自己著的。趙岐在孟子題辭中說：“此書，孟子之所作也，故總謂之孟子。”焦循正義引元人何異孫十一經問對闡明此說云：“論語是諸弟子記諸善言而編成集，故曰論語，而不號孔子。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，如荀子，故謂之孟子。”趙岐甚至把孟軻爲什麼要著書的動機都設想出來，他在題辭中又說：“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，值炎劉之未奮，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，退不能信（同伸）三代之餘風，恥沒世而無聞焉，是故垂憲言以詔後人。仲尼有云，我欲託之空言，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、萬章之徒難疑答問，又自撰其法度之言，著書七篇。”

後來，宋代朱熹從文章風格的一致性上來論證孟子爲孟軻自己寫成的。雖然他有時也作些調停之論，如說，“然其間有如云‘孟子道性善，言必稱堯舜’。亦恐是其徒所記；孟子必曾略加刪定也。”但他主要議論仍是：“論語多門弟子所集，故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。孟子疑自著之書，故首尾文字一體，無些子瑕疵。不是自下手，安得如此好？”又說：“觀七篇筆勢如鎔鑄而成，非綴緝可就。”（以上引文全見朱子大全）其後元人金履祥、明人郝敬的看法都和他相同。

清代閻若璩，又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推論孟子爲自著，他在孟子生卒年月考最後一段說：“論語成於門人之手，故記聖人容貌甚悉；七篇成於己手，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。”魏源在孟子年表考中也說：“七篇中無述孟子容貌言動，與論語爲弟子記其師長不類，當爲手著無疑。”

第二種說法則剛剛和這相反，認為孟子是孟軻死後他的門弟子萬章、公孫丑之徒共同記述的。最初發表這種議論的是唐代韓

愈(見昌黎集答張籍書)和張籍(見全唐文上韓昌黎書)。附和這種議論的有唐人林慎思(見崇文總目)和宋人蘇轍(見其所著古史孟子傳)，可是他們都沒有舉出佐證來。

對這種說法加以闡明的最初有宋人晁公武。他在郡齋讀書志中說：“按此書韓愈以爲弟子所會集，非軻自作。今考其書，則知愈之言非妄也。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諡，如齊宣王、梁惠王、梁襄王、滕定公、滕文公、魯平公是也。夫死然後有諡。軻著書時，所見諸侯不應皆死。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，孟子見梁惠王，王目之曰叟，必已老矣，決不見平公之卒也。”

其後清人崔述在孟子事實錄中對此說多列了兩條證據。他說：“孟子七篇之文，往往有可議者，如禹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，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之屬，皆於事理未合。果孟子自著，不應疏略如是。”又說：“七篇中於孟子門人多以子稱之，如樂正子、公都子、屋廬子、徐子、陳子皆然，不稱子者無幾。果孟子所自著，恐未必自稱其門人皆曰子。細玩此書，蓋孟子門人萬章、公孫丑等所追述，故二子問答之言在七篇中爲最多，而二子在書中亦皆不以子稱也。”

較崔述略早的周廣業也認爲孟子不是孟軻所著。他在孟子出處時地考中說：“此書攸次數十年之行事，綜述數十人之問答，斷非輯自一時，出自一手。其始章丑之徒追隨左右，無役不從；於孟子之言動，無不熟察而詳記之。每章冠以‘孟子曰’者，重師訓，謹授受，兼法論語也。”但是他還是認爲其中也有孟軻自己的筆墨。他又道：“迨還自青齊，既難必於行道，而孟子亦欲垂教後世，取向所進說時王，傳授弟子者潤飾而刪定之。”他的結論是：“至其後編次遺義，又疑樂正子及公都子、屋廬子、孟仲子之門人與爲之。何也？諸子皆孟門高弟，七篇中無斥其名，與滕更呼名之例不同，當

是其徒所追改。而首篇以孟子始，以樂正子終，未必不由此也。”

第三種看法是太史公在孟荀列傳中所說的：“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，述仲尼之意，作孟子七篇。”從這幾句話，我們得到這樣的概念：孟子的著作，雖然有“萬章之徒”參加，但主要作者還是孟子自己，而且是在孟子生前便基本上完成了的。關於這一點，魏源在孟子年表考中有所體會，他說：“又公都子、屋廬子、樂正子、徐子皆不書名，而萬章、公孫丑獨名，史記謂退而與萬章之徒作七篇者，其爲二人親承口授而筆之書甚明（咸邱蒙、浩生不害、陳臻等偶見，或亦得預記述之列）。與論語成於有子、曾子門人故獨稱子者，殆同一間，此其可知者。”

以上三種說法，雖各言之成理，但符合於歷史客觀事實的，當然只有一種。我們認爲，太史公的話是可信的。他的時代較早，當日所見到的史料，所聽到的傳聞，比後人多而且確實；尤其是驗以孟子本書，考之孟子生卒，其餘兩種說法所持的理由都是不充分的。

趙岐明明說，“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、萬章之徒難疑答問”，則七篇之中自有弟子的記錄。朱熹雖主張爲孟子一手著成的，但也不會否認在著作過程中有弟子參加。只是說，從文體的首尾一致看來，孟子是最後的訂定者。這從他“亦恐其徒所記，孟子必曾略加刪定也”一句話可以看出。所以他們兩人的看法和太史公的說法相距不遠。

第二種說法，認爲孟子是孟軻死後他的門弟子所記述的，便和太史公的說法出入很大。他們舉了三種理由。有一條理由是，“七篇之文，往往有可議者，果孟子自著，不應疏略如是。”這實在不值一駁。孟子即便是所謂“亞聖”，也不能肯定他所說所寫的每字每句都非常正確。何況“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”這種話，孟子不過

借以說明禹治水的功績；正確的地理知識的具備與否，上古的所謂聖賢，似乎不曾給以重視。伊尹“五就湯五就桀”，孟子也不過借以說明伊尹全心為百姓服務的忠誠；而且孟子援引史事，常常主觀地加以改造，以期論證自己的觀點。稍讀孟子書就會了解這一點。這正是孟子辯論的手段哩。另一條理由是“果孟子自著，恐未必自稱其門人皆曰子”。這一點，上引魏源的話已經說得明白。孟子既是萬章、公孫丑之徒“親承口授而筆之書”，那麼，稱其師為“孟子”，稱其同門為“樂正子”、“屋廬子”，何嘗不可？周廣業以此和論語同樣看待，認為是樂正子等的門人所編次，那是錯誤的。我們只要問，如果是樂正子之徒的門人所編次，為什麼七篇中記樂正子諸“子”的問答反而很少，而記萬章、公孫丑之徒的問答反而很多呢？最值得注意的是諸侯皆稱諡一條。梁惠王、滕文公、魯平公都死在孟子前，固然可以稱諡；梁襄王是死在孟子後的，齊宣王也可能比孟子遲死三兩年，為什麼也稱諡呢？我們認為閻若璩的解釋是說得通的。他說：“卒後書為門人所敘定，故諸侯王皆加諡焉⑨。”

三

史記孟荀列傳只說“作孟子七篇”；到應劭 風俗通 窮通篇却說，“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，作書中外十一篇”；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也說“孟子十一篇”。趙岐 孟子章句，便給這十一篇分列真偽，題辭說：“又存外書四篇——性善辨、文說、孝經、為政⑩——其文不能宏深，不與內篇相似，似非孟子本真，後世依放而託也。”因為趙岐肯定外書是贗品，不給它作注解，以後讀孟子的人便不讀它，於是逐漸亡佚了。南宋 孫奕的示兒篇說：“昔嘗聞前輩有云，

親見館閣中有孟子外書四篇。”南宋上距東漢末一千多年，而孟子外書完好地藏在宮禁中，這話是否靠得住，很有問題，可能是所謂“前輩”的誑語。劉昌詩蘆浦筆記說：“予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，有性善辯一帙。”這一帙性善辯，劉昌詩似乎親自見過，但也不曉得果是趙岐所見之書否。至於現在所傳的孟子外書四篇，則是明人姚士粦所偽撰，為清代吳騫刊行的時候，周廣業等便指出“顯屬偽託”，而丁杰在小西山房集中更已逐條駁斥它了。所以梁啓超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中說它是“偽中出偽”。

趙岐的題辭又說：“孟子退自齊梁，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，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。”又說：“論語者，五經之館鑄，六藝之喉衿也。孟子之書則而象之。”這些話，把孟子和論語相比，似乎有些道理，也確實代表了兩漢人一般的看法。所謂似乎有些道理，我們拿它和當時別的子書一比較便知。墨子成書年代雖不敢完全肯定，但其中有若干篇是墨子的弟子所作，其成篇甚或早於孟子，應該不必懷疑，莊子生卒年月僅略後於孟子，荀子的早年也和孟子的晚年相值者有三十多年。莊子的內篇應該是莊周的手筆，荀子則基本上是荀卿的手筆。墨子、莊子內篇、荀子都是每篇各有主旨，而篇名也與主旨相應。孟子却不然，各章的篇幅雖然比論語長，但各章間的連繫並沒有一定的邏輯關係；積章而成篇，篇名也只是撮取第一句的幾個字，並無所取義。這都是和論語相同，而和墨子、莊子、荀子相異的。所以趙岐說孟子是擬論語而作，不無道理。

趙岐把論語看成是“五經之館鑄，六藝之喉衿”，孟子又是“擬聖而作”，那孟子也成爲經書的傳記了。儘管漢書藝文志把孟子放在諸子略中，視爲子書，但漢人心目中却把它看爲輔翼“經書”的“傳”。漢文帝把論語、孝經、孟子、爾雅各置博士，便叫“傳記博

士”。王充論衡對作篇說：“楊墨之學不亂傳^①義，則孟子之傳不造。”明明把孟子看爲傳。又如漢書劉向傳、後漢書梁冀傳、說文解字等書所引孟子都稱“傳曰”。可見把孟子和論語並列，不是趙岐“一人之私言”，而是兩漢人的公論。

到五代後蜀時，後蜀主孟昶命毋昭裔楷書易、書、詩、儀禮、周禮、禮記、公羊、穀梁、左傳、論語、孟子十一經刻石，宋太宗又加翻刻，這恐怕是孟子列入“經書”的開始。到南宋孝宗的時候，朱熹在禮記中取出大學、中庸兩篇，認爲是曾子和子思的作品，與論語、孟子合在一起，稱爲四書，於是孟子的地位便更加提高了。到明清兩朝，規定科舉考試中八股文的題目從四書中選取，而且要“代聖人立言”，於是當時任何讀書人便不得不把孟子讀得爛熟了。

四

孟子自認爲是孔子的忠實信徒，依他自己說：“乃所願，則學孔子也。”因之，他把孔子地位抬得極高，他引用孔子學生宰我、子貢、有若的話，說：“自生民以來，未有盛於孔子也。”(3·2)

孟子最後一章，即盡心下的第三十八章，提出了堯、舜、湯、文王、孔子。這是儒家“道統”的先聲。他把這一章安排在全書之末，我認爲是有特殊意義的。韓愈作原道更明確地說：“堯以是傳之舜，舜以是傳之禹，禹以是傳之湯，湯以是傳之文、武、周公，文、武、周公傳之孔子，孔子傳之孟軻。”孟子以接受孔子傳統自居，却不明說，只暗示說：“由孔子而來至於今，百有餘歲，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，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，然而無有乎爾，則亦無有乎爾。”當時和孔子出身地最近的有名望的儒者，除了孟子，更無他人。孟子說“無有乎爾”，正和“夫聖，孔子不居”(3·2)一樣，是不能

明說的。孟子認為孔子是聖人(3·2),那麼,他自然也是孔子之學的繼承者。韓愈也以承繼道統自居,也不明說,只寫道:“軻之死,不得其傳焉。荀與楊也,擇焉而不精,語焉而不詳。”和孟子筆法不同,用意則一。

孟子雖然自以為是孔子之學的繼承者,但因為時代已經相距百把年,形勢也發生很大的變化,孟子對孔子學說不但有所取捨,而且有所發展。

首先,孟子和孔子之論“天”稍有不同。“天”的意義,一般有三、四種。一是自然之天,一是義理之天,一是主宰之天,一是命運之天。孟子講“天”,除“天子”“天下”等雙音詞外,連“天時”“天位”“天爵”等在內,不過八十多次。其中有自然之天,如:“天油然作雲,沛然下雨。”(1·6)“天之高也。”(8·26)有義理之天,如:“仰不愧於天,俯不忤於人。”(13·20)“存其心,養其性,所以事天也。”(13·1)有命運之天,如:“若夫成功,則天也。”(2·14)“吾之不遇魯侯,天也。”(2·16)却没有主宰之天。在孟子中還有一種意義比較艱深的“天”,其實也是義理之天,或者意義更深遠些,如:“天不言,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。”(9·5)實質上,這種“天”,就是民意。孟子說得明白:“太誓曰:‘天視自我民視,天聽自我民聽。’”孟子中所謂“天吏”、“天位”、“天職”、“天祿”、“天爵”,都是這種意義;而這種意義,是在論語中所沒有的。論語堯曰篇有“天祿”一詞,和孟子“弗與食天祿也”(10·3)意義有所不同。論語的“天祿”是指帝位,孟子的“天祿”是指應該給予賢者的俸祿,依它們的上下文一加比較,便可以看出其中的歧異。

孟子也講“命”,或者“天命”。孟子對這個曾經給了一個定義:“莫之為而為者,天也;莫之致而至者,命也。”(9·6)就是說,命運是

一種無形而巨大的力量，却没有主宰者或指使者。孟子甚至把天下形勢的變動，即“有道”和“無道”也歸之於“天”，即命運：“天下有道，小德役大德，小賢役大賢；天下無道，小役大，弱役強。斯二者，天也。順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。”(7·7)然而孟子絕不是宿命論者。他對命運的態度是：“莫非命也，順受其正；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。盡其道而死者，正命也；桎梏死者，非正命也。”(13·2)在孟子看來，無論命運有多麼巨大的力量，但我還依我的“仁義”而行，不無故送死。祇要“盡”我之“道”，死也是“正命”；如果胡作亂為，觸犯刑罰而死，便不是“正命”。

其實，大至天下形勢，小至個人前途，既有必然性，也有偶然性。而且，必然之中有偶然，偶然之中也有必然。古人對這個道理是不明白的，無以歸之，歸之于“天”，于“命”。在孔、孟中，孟子對待“天命”便有比較合理的言論。

孔子重視祭祀，孟子便不大多講祭祀。論語僅一萬二千七百字，“祭”字出現十四次；孟子有三萬五千三百七十多字，為論語2.7倍強，“祭”字僅出現九次，“祭祀”出現二次，總共不過十一次，而且都未作主要論題。

第二，孔子講“仁”，孟子則經常“仁義”並言。孔子重視人的生命，孟子更重視人民生存的權利。孔子因為周武王以討伐商紂而得到天下，談論音樂，認為周武王的樂舞武“盡美矣，未盡善也”(論語譯注3·25)。孟子却不如此。齊宣王說“武王伐紂”是“臣弑其君”，孟子答說：“賊仁者謂之賊，賊義者謂之殘。殘賊之人謂之一夫。聞誅一夫紂矣，未聞弑君也。”

鄒國曾和魯國發生衝突，鄒國的有關官吏死了三十三人，老百姓却一個也沒有死，而且眼望着他們的上級去死而不救助。孟子

對鄒穆公說：“活該！誰叫你和你的臣下平日殘忍地對待老百姓哩！以眼還眼，以牙還牙。你們的老百姓今天可找着報復的機會了！”孟子不但主張“民爲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爲輕”(14·14)，還主張“貴戚之卿”可以廢掉壞君，改立好君。這種思想，是孔子仁的學說大發展，在先秦諸子中是絕無僅有的。

因之，孟子看君臣間的互相關係也比孔子有所前進。孔子只說“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”(論語譯注3·19)，孟子却說：“君之視臣如手足，則臣視君如腹心；君之視臣如犬馬，則臣視君如國人；君之視臣如土芥，則臣視君如寇讎(8·3)。”這種思想比後代某些“理學家”所謂“君要臣死，不得不死”高明而先進不知多少倍啦！

第三，孟子“道性善”(5·1)。並且說：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”“無惻隱之心，非人也；無羞惡之心，非人也；無辭讓之心，非人也；無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”(3·6)還說：“萬物皆備於我矣。”(13·4)由于這類的话，孟子便被某些人加上主觀唯心主義者的帽子。但扣帽子的人，我認爲並沒有透澈了解孟子思想。扣他以主觀唯心主義的帽子是不符合他思想實際的。

我們應該了解，孟子所謂“性善”，其實際意義是人人都有爲善的可能，用孟子的話說，“乃若其情，則可以爲善矣，乃所謂善也。若夫爲不善，非才之罪也”(11·6)。

最可以注意的，一是孟子承認環境可以改變人的思想意識。他說：“富歲，子弟多賴；凶歲，子弟多暴，非天之降才爾殊也，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。”(11·7)二是他承認事物各有客觀規律，而且應該依照客觀規律辦事。他說：“天下之言性也，則故而已矣。故者，以利爲本。所惡於智者，爲其鑿也。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，則無惡於智矣。禹之行水也，行其所無事也。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，則智

亦大矣。天之高也，星辰之遠也，苟求其故，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。”(8·26)相傳禹懂得水性，所以治水能成功。孟子認為一切都有各自的客觀規律，依客觀規律辦事，便是“行其所無事”而不“鑿”。即使天高得無限，星辰遠得無涯，只要能推求其“故”(客觀規律)，就在當時以後一千年內的冬至日，也可以在房中推算出來。這種言論，難道是“主觀唯心主義者”能說得出來的嗎？

判斷一位哲學家是唯心還是唯物，依馬克思列寧主義，只有一個標準，就是思想意識是第一性的，還是物質是第一性的。孟子只講人有惻隱、羞惡、辭讓、是非之心，這四種心是仁、義、禮、智四端。端就是萌芽，也可以說是可能性。說人有某種可能性，並不等於說人有某種思想意識。孟子說“矢人唯恐不傷人，函人唯恐傷人”(3·7)，這是由于他們職業的關係，可見人生不一定是“仁人”。孟子講性，還涉及兩件事，一曰，“食色，性也”(11·4)，一曰，“形色，天性也”(13·38)。求生存和求配偶，不但是人類的本能，也是其他動物的本能。每種動、植物，都有各種形體容貌，在當時，自然都是自然賦予的。孟子這些話並沒有錯。唯有性善，他作了幾處解釋，就是怕人誤解、歪曲，而某些人竟誤解、歪曲它了。

至于“萬物皆備於我”，這說的是自我修養。在這一章上，另有一章，全文如下：“求則得之，捨則失之，是求有益於得也，求在我者也。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，是求無益於得也，求在外者也。”由此可見，孟子認仁義道德是“求則得之”“在我”的東西，而富貴利達是“得之有命”“在外”的東西。“萬物皆備於我”的“萬物”，是最大的快樂，是自身本有仁義道德，既不是主觀的虛幻境界，也不是超現實的精神作用。這裏談不上唯心和唯物。

最後，孟子的政治主張，是保守的，有的甚至是倒退的，如要滕

文公行井田制(5·3),這是事實上行不通的,滕國也不可能執行。

孟子強調“仁義”,而在當時,七大雄國——秦、楚、齊、燕、韓、趙、魏(梁)——只講富國強兵。孟子却說:“故善戰者服上刑,連諸侯者次之,辟草萊、任土地者次之。”不知這幾項正是當時形勢迫使各大國非這樣做不可。趙國有廉頗、趙奢、李牧,便能抵抗侵略;燕國有樂毅,便能收復全國,並深入齊國;齊國有田單,便全部收復失地。縱不侵犯別國,在各國互相窺伺、吞併下,爲了保衛自己,沒有“善戰”的大將是不行的,何況當戰國時,不但各國雄主多有統一天下的野心,即使是老百姓也苦于幾百年來大大小小的戰爭未曾停止,迫切希望天下一統呢!一部戰國策,基本上講的是合縱連橫之術。要打仗,便得多多聯合同盟國家,那能不“連諸侯”呢?至于開墾土地,發展農業,更是當時“富國”的最重要的途徑,商鞅爲秦孝公“爲田開阡陌封疆”(史記商君列傳),奠定秦國富強的基礎。司馬遷述評孟軻“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”,一點也沒冤枉他。

① 孟子名叫軻,這從他回答北宮錡話“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”(10·2),便可知。古人很重視表字。孟子的字是什麼,說法不一,東漢趙岐的孟子題辭說沒有聽到過;三國魏徐幹的中論序也說沒有傳下來;後來魏人王肅作聖證論,說他字子車;晉人傅玄作傅子說他字子輿。趙岐徐幹所不知道的,王肅傅玄怎麼知道?可見這是他們編造出來的。

② “鄒”,史記孟荀列傳作“騶”,古國名。故城在今山東鄒縣,離孔子故鄉曲阜不遠,所以孟子自己也說,“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。”(14·38)

③ 可參閱清周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、魏源古微堂外集孟子年表及宋翔鳳過庭錄孟子事跡考。

④ 據四庫總目提要,這書不是程復心所作,而是譚貞默的孟子編年略。

⑤ 詳毛奇齡四書賸言所引王草堂復禮辨和孔繼汾闕里文獻考。

⑥ 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一編,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,第246頁。